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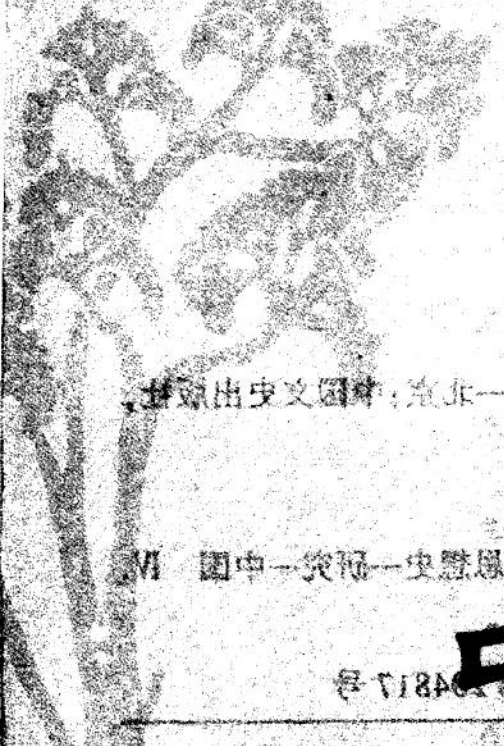
# 中国儒学发展史



中

黄宣民 陈寒鸣 主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ISBN 978-7-309-0481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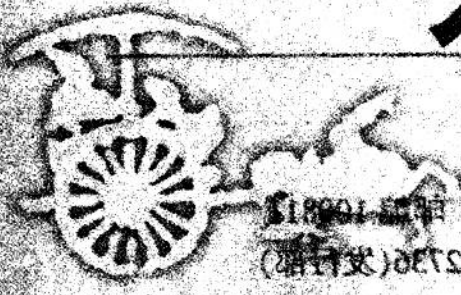
中国儒学发展史

30000

ISBN 978-7-309-04817-3

中国儒学发展史

# 中国儒学 发展史



中国儒学发展史

www.wenhuapress.com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3号 邮编100813

黄宣民 陈寒地 主编

010-69153307 010-69153307

北京人民印刷厂

32开

2500字

2009年6月北京第1版

2009年6月北京第1版

158.00元

中国儒学发展史

中国儒学发展史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儒学发展史.中/黄宣民,陈寒鸣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9.3

ISBN 978—7—5034—2271—3

I.中… II.①黄…②陈… III.儒家—思想史—研究—中国 IV.  
B2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4817 号

---

责任编辑:韩军

---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发行部)

传 真:010-66192703

印 装:北京东光印刷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32

字 数:2200 千字

版 次:2009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28.00 元(上、中、下)

---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 目 录

## 上

序	刘泽华	(1)
绪论		(1)
一、中国:社会的变革与儒学演进		(1)
二、经世致用:儒学基本特征举析之一		(10)
三、不断创新和自我改造:儒学基本特征举析之二		(25)
四、儒家伦理与宗法社会		(34)
五、从传统到现代的考察——以儒家“民本”传统为例		(46)
第一章 孔子和早期儒学		(117)
第一节 上古礼乐文明与原始儒学		(118)
附录一] 从巫祝文化到礼乐文明的历史转变		(137)
[附录二] 神守、社稷守与“儒”及儒家的产生		(148)
第二节 西周王官之学的确立及其衰微		(166)
第三节 齐鲁文化与儒学的诞生		(177)
第四节 儒家开山祖孔子与六经		(188)
第五节 孔门弟子与早期儒学的传播		(215)
[附录一] 颜回与“颜氏之儒”探微		(232)
[附录二] 论孔门后学的分化		(240)
第六节 思孟学派及其对儒学发展的贡献		(257)
第七节 郭店楚简与战国早期儒学		(275)

[附录一] 郭店楚简与《中庸》	(301)
[附录二] 郭店楚简与“君子慎独”	(327)
第八节 荀卿学派及其对儒学发展的贡献	(336)
<b>第二章 秦代的儒生与儒学</b>	<b>(363)</b>
第一节 秦初的文化政策与儒生的任用	(363)
第二节 秦代刻石及简文所见的儒家思想	(374)
第三节 秦代儒生的仕学分化与儒学的官私并存	(381)
第四节 “焚书坑儒”与先秦儒学的终结	(386)
<b>第三章 汉代儒学:封建社会官方儒学的建立</b>	<b>(391)</b>
第一节 汉代儒学复兴及其历史地位	(392)
第二节 “天人三策”:武帝对儒学的选择	(408)
第三节 皇权与经学——儒家经籍的法典化	(438)
第四节 神学化的经学思潮	(451)
[附录] 汉儒讖纬神学中的科学内容	(466)
第五节 儒学的神学化与汉儒的造神运动	(474)
第六节 今古文经学及其对儒学发展的影响	(493)
第七节 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理论体系	(517)
[附录] 《春秋》与西汉社会生活	(550)
第八节 《孝经》的形成及其历史意义	(563)
第九节 政治经典与经典政治:《周礼》与古代理想政治	(583)
第十节 郑玄《三礼注》及其儒学史意义	(614)
<b>中</b>	
<b>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儒学</b>	<b>(663)</b>
第一节 经学与玄学	(664)
第二节 南朝玄学的蜕变与礼学的复兴	(690)

第三节 北朝少数民族的汉化及儒学的汉学特色	(703)
第四节 注疏经学	(711)
第五节 隋唐科举制与儒家义疏学的进一步发展	(719)
第六节 唐中叶及其后儒学发展的新迹像	(744)
第七节 敦煌儒学	(767)
第五章 道学兴起与两宋儒学	(784)
第一节 “庆历新政”与宋学的开端	(784)
第二节 “道学”、“理学”、“心学”定名缘起	(788)
第三节 儒学趣向的转化:义理之学的兴起	(796)
第四节 荆公新学的特点及其在儒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814)
第五节 理学的形成和发展	(831)
第六节 苏氏蜀学学风与东坡易学	(869)
第七节 书院儒学教育	(890)
第八节 朱熹集大成的心性学说	(908)
第九节 理学化经学的典范: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	(927)
第十节 陆学的立世精神	(952)
[附录] 朱熹与陆九渊的学术争论	(967)
第十一节 陈亮、叶适的事功之学与唐仲友的经制之学 ——南宋与道学相异趣的事功之学思潮	(975)
第十二节 “学圣”与理学在儒学史上的特殊贡献	(1052)
[附录] 宋儒孟子观述论	(1071)
第十三节 道学化的经学思潮	(1090)
第十四节 《伊川易传》的特色及其意义	(1107)
第十五节 北宋儒者文士与党争	(1122)
第十六节 南宋道学与反道学之争	(1176)
第六章 辽金元时期的儒学	(1186)
第一节 辽、金统治者对儒学的尊崇及金朝儒学的特色	(1186)

第二节 西夏遵行儒学,“渐行中国之风”	(1192)
第三节 元代“用夷变夏”思潮与理学的官学化	(1195)
第四节 金华朱学的主要特点和历史影响	(1206)
第五节 元代的朱、陆合流和陆学	(1237)
第六节 吴澄的“道统”论与经学	(1243)
[附录] 元儒吴澄对《礼记》的改编	(1248)

## 下

第七章 明代儒学	(1267)
第一节 朱元璋与洪武儒学	(1267)
第二节 朱棣的儒学思想	(1334)
第三节 朱学流变	(1347)
第四节 程敏政及其朱、陆“早异晚同”论	(1363)
第五节 王守仁心学及其对儒学的革新意义	(1405)
[附录] 阳明心学兴盛原因探析	(1414)
第六节 阳明心学与封建政治	(1424)
第七节 阳明哲学的视角	(1434)
第八节 王良的“百姓日用之学”	(1450)
第九节 平民儒者颜钧及其“大成仁道”	(1480)
[附录] 《颜钧集》与明代中后叶的平民儒学	(1511)
第十节 泰州王门巨——擘王一菴的哲学思想	(1522)
第十一节 韩贞的平民儒者风范与罗汝芳的理学思想	(1537)
[附录] 罗汝芳的平民儒学思想及其讲学实践	(1552)
第十二节 泰州王学后劲焦竑	(1576)
第十三节 袁宏道与泰州王学	(1590)
第十四节 诸种思潮交汇下的汤显祖的思想	(1612)
第十五节 张居正与阳明心学	(1624)
第十六节 王湛心学与书院教育的再度辉煌	(1646)

第十七节 晚明儒者文士的“狂者胸次”	(1657)
第十八节 鹿善继与燕南王学	(1668)
第十九节 蕺山心学与晚明思潮	(1720)
第二十节 晚明清初的名节思潮	(1766)
<b>第八章 兼综汉宋的清代儒学</b>	(1781)
第一节 黄宗羲与清初启蒙儒学	(1781)
第二节 傅山“异端”思想的风骨	(1792)
第三节 顾炎武与清初学风的转变	(1809)
第四节 李颙与清初山林儒学	(1824)
第五节 康熙帝与清初庙堂儒学	(1832)
[附录] 庙堂理学的政治思想	(1841)
第六节 乾嘉汉学及其对儒学发展的重大贡献	(1852)
第七节 朴学化的经学思潮	(1878)
第八节 戴震披着“经言”外衣的启蒙学说	(1895)
[附录] 戴震与中国早期启蒙思潮	(1912)
第九节 袁枚对正宗儒学传统的批判	(1922)
第十节 崔述与清代疑古儒学	(1937)
第十一节 晚清公羊学的兴起与康有为的维新思想	(1972)
第十二节 谭嗣同的“冲决网罗之学”	(1990)
第十三节 西学化的经学思潮	(2004)
第十四节 儒学在近代中国的命运及其前瞻	(2021)
[附录] 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	(2040)
<b>结束语 :关于儒学的现代发展问题</b>	(2051)
后 记一                    陈寒鸣	(2074)
后 记二                    黄 勤	(2083)



##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儒学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儒学,在曲折而又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发展着。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经学式微,玄学兴起。玄学名士们或挥麈谈玄,或服药行散,或纵酒昏酣,或裸袒形体。他们禀承老庄之余韵,蔑弃儒家之礼度,开启了一代玄风。“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行信”<sup>(1)</sup>，“借玄虚以助溺,引道德以自奖;户咏恬旷之辞,家画老庄之像”<sup>(2)</sup>。玄学风靡草偃,蔚为时尚,成为与两汉经学相对立的思想文化领域的主流。但玄学在否定经学的同时,又与之有天然联系,并对后世的儒学、经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经学与玄学这两种思潮遂既相互对立,又一脉相承;玄学是两汉经学的蜕变,而又在思维方式、思想学说和精神风貌上影响了当世经学与后来的宋明理学,它也就因之而成为儒学发展链条上一个不可或缺的一环。

隋唐时期,与“大一统”专制国家社会结构的重建相适应,统治者莫不尊崇儒学,且诏颁《五经正义》,实施科举取士制度等,以强化儒家思想统治。以韩愈为代表的儒家学者更揭橥“原道”徽帜,鼓倡儒学复兴运动。这些都对儒学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这时期在社会生活中和思想文化领域兴盛着的佛教,对儒学形成巨大挑战和冲击。儒学在与佛学的抗争中,既扞斥佛学,又对佛学有所吸纳,从而使儒学在应对佛学挑战与冲击过程中获得了发展。

## 第一节 玄学与儒学

### 一、经学的式微与延续

两汉时期,儒家经学盛极一时,而到了东汉末叶则日渐衰微。两汉经学的衰微,自有其学术内部的原因,象章句之学的烦琐支离,讖纬迷信的荒诞不经,师法家法的故步自封和经今、古文学的互相水火,学术论争与权势之争相互交错的纷争不已,如此等等。而其最主要的原因恐怕是伴随着东汉末期政治危机而来的道德危机。

汉代以来,儒家伦理学说一直依附于礼俗和政治,以之作为其行于世的两大凭藉。一方面,儒学与宗法等级社会的礼仪习俗相衔接,其伦理道德学说附丽于礼俗之中,礼仪形式成了儒家道德理想的外在体现、践履途径和检验标准。这种伦理道德学说与礼仪习俗相结合的特点,始自儒学产生之初。儒家本是由春秋时为贵族襄礼作乐的搢绅先生蜕变而来的,其与宗法社会的礼仪习俗有着天然的联系。孔子给原始礼俗注入了道德内涵(纳“仁”入“礼”),建构了一套完整的伦理思想体系,从而创建了儒家学派。另一方面,儒学与现实政治又有着不解之缘,尤其是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学说与皇权紧密结合起来,儒者借助统治者的权力来推展其学,实现他们的道德理想,政治上的褒贬奖罚乃至生杀予夺成了保证合理规范得以遵循的外在力量,而统治者则依靠儒家伦理学说教化、感染民众和协调社会关系的功能来维护既存的社会秩序的稳定与运转。道德标准遂成为政治上迁升贬黜的重要依据尺度。由于儒学与礼俗和政治的这种紧密结合,随着封建王朝的不断腐化与衰败,必然造成儒学的蜕化与沉沦,走向虚伪和形式化,最终导致全社会的道德危机、信仰危机。因为对统治者来说,他们对儒学的青睐,完全是出于维护其现实统治的狭隘的功利主义目的,原始儒学中的人本主义和仁爱思想只是作为粉饰其专制暴力统治的道德装潢,而断断不会基于对儒学的真诚信仰而真心实意地将之付诸实施。思想

学说与专制皇权的结合，必然使思想不断受到政治动机的牵引而改变其本来面目。而儒生们慑于暴力的淫威和功利的诱惑，终免不了曲说奉迎，卖论取官，弄虚作假，口是心非。这种病态现象在东汉末叶及魏晋之际表现得尤为严重。欺世盗名，真伪混杂，虚实相蒙，礼仪形式与内容的脱节，道德之名与道德之实的分离，诸如此类使道德的现实性日益丧失，成为自欺欺人的空洞教条。一句话，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已难以维系人心了。

《后汉书·李膺传》载：

时，李膺为青州刺史，……民有赵宣葬亲而不闲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余年，乡邑称孝，州郡数礼请之。郡内以荐蕃，蕃与相见，问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圣人制礼，圣者俯就，不肖企及。具祭不欲数，以其易蹊故也。况及寝宿家藏，而孕育其中，诬时惑众，诬汗鬼神乎？”遂致其罪。

这则故事表明当时儒家道德学说已成了“诬时惑众”、射取名利的招牌。这种真假相冒、欺世盗名之事，在东汉后期绝非鲜例，而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文献中所谓“刻情修容”、“纯盗虚名”<sup>(3)</sup>，“偷世盗名”、“虚造空美”<sup>(4)</sup>，“父盗子名，兄窃弟誉，骨肉相治，朋反相诈”<sup>(5)</sup>，“真伪浑杂，虚实相蒙”<sup>(6)</sup>云云，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表现出东汉末的道德危机已很深重。

魏晋之际，代表门阀士族利益的司马氏集团，觊觎王位，计谋皇祚，儒家道德的虚伪性在他们身上得到更加充分的体现。司马氏集团一方面利用名教来自我标榜，装潢门面，史载：司马懿“博学洽闻，伏膺名教”<sup>(7)</sup>；司马师“履义执忠”，“以至孝闻”<sup>(8)</sup>；司马炎“孝弟忠信”<sup>(9)</sup>。另一方面，他们又假借名教来诛除异己，肆意杀伐，如以“无君之心”杀曹爽<sup>(10)</sup>、以“毁人伦之叙，乱男女之节”废齐王曹芳<sup>(11)</sup>、以“将危社稷”杀夏侯玄和张揖<sup>(12)</sup>、以“反志”和“祸乱”平“淮南三叛”、以“悖逆不道”杀曹髦<sup>(13)</sup>等等。司马氏的这一切篡夺活功，都是在维护伦理纲常的幌子下进行的，而这无疑更加剧了汉末以来的道德危机、儒学信仰危机和王权政治危机。

汉魏之际不断发生的起义、战乱、割据等所造成的社会动荡也是经学衰微不可忽视的原因。史书记载东汉末战乱频仍对儒学的负面影响道：

……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竟其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腾囊。乃王先所发而西者，载七十余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其不泯焉！（14）

遭天下大乱，百祀堕坏；旧居之庙，毁而不修；褒成之后，绝而莫继；阙里不闻讲颂之声，四时不覩蒸尝之位。（15）

世之质文，随教而竞。兵乱以来，经学废绝，后生进趣，不由典谟。（16）

经学日渐衰颓，玄学却恰逢其时地兴盛起来。而魏晋时期的玄学之风扇于海内，赢得了不少文人学子的欣然响应，这也使得传统经学的影响受到削弱。刘勰在《文心雕龙·经说》中说：

迨至正始，各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是聃、周当路，与尼父争途矣。

《晋书·向秀传》讲到向秀注《庄子》事时亦云：“（向秀）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广之，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焉。”当然，魏晋时期的儒家经学，尽管时运多舛，已难重现两汉时期的盛况，甚至不再是思想文化领域的主流，但并未就此泯灭，而是在困境中传衍流转，不绝如缕，代有传人。

东汉末及魏晋时期的统治者，在攻城略地、戮杀篡夺之余并未忘记尊崇儒家经学，推行纲纪伦常。如：孔融任北海相时，“正学校，表显儒术，荐举贤良郑玄、彭繆、邴原等”；<sup>（17）</sup>刘表占据荆州，“关西、袞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表安慰赈贍，皆得资金。遂起立学校，博求儒术，蔡母、宋忠等撰立《五经章句》，谓之‘后定’”；<sup>（18）</sup>刘备在蜀国，“承丧乱历纪，学业衰废，乃鳩合典籍，沙汰众学，（许）慈、（胡）潜并为学士，与孟光、朱敏等典章旧文”。<sup>（19）</sup>

至于曹魏政权,在曹操统治时期,荀彧就曾向他进谏曰:

教化、征伐,并时而用。……宜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论《六经》,刊定传记,存古今之学,除其烦重,以一圣真,并隆礼学,渐敦教化,则王道两济。<sup>(20)</sup>

袁涣也对曹操讲:“夫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义。……今天下之难已除,文、武并用,长久之道也。以为可大收篇籍,明先圣之教,以易民视听,使海内斐然向风,则远人不服可以德来之。”<sup>(21)</sup>然而,生当乱世的曹操,尽管他曾举魏种孝廉,赞华湛“夫人孝于其孝者,岂不亦忠于君乎?”称马融的学生卢植“学为儒宗,士之楷模”,并对当时道德沦丧的状况深为忧虑,但毕竟无暇顾及全面推礼隆乐,尊显儒学。而到了文帝曹丕执政时,便得以召集群儒整理儒家典籍,“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sup>(22)</sup>。华歆建言:“丧乱以来,六籍坠废,当务存立,以崇王道。今举孝廉不以经试,恐学业遂从此而废。”<sup>(23)</sup>文帝采纳这一建议,“立太学,制《五经》课试之法”,“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并说:“缙绅考六艺,吾将兼览焉”,自称:“吾备儒者之风,服圣人之遗教。”<sup>(24)</sup>明帝曹睿在位时重经学而罢浮华,他认为:“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自顷儒官或非其人,将何以宣明圣道?”故下诏曰:“其郎吏学通一经,才任牧民,博士课试,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华不务道术者,皆罢退之。”<sup>(25)</sup>齐王曹芳则诵讲《论语》、《尚书》、《礼记》,“以太牢祀孔子于辟雍,以颜渊配”<sup>(26)</sup>。当然,曹魏之世由于离东汉末的起义、内乱不远,且与蜀、吴三足鼎立,天下未宁,汉末以来饱受磨难的儒家学术文化尚一时难以全面恢复。《三国志·魏书·钟繇华歆王朗传》注引《魏略序》说:

从初平之元,到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甚。至黄初元年之后,新主乃复,始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缺坏,备博士之员录,依汉甲乙以考课。申告州郡,有欲学者,皆遣诣太学。太学始开,有弟子数百人。至太和、青龙中,中外多事,人怀避乱。虽性非解学,多求诣太学。太学诸生有千数,而

诸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弟子本速避役，竟无能习学，冬来春去，岁岁如是。……正始中，有诏议圜丘，普延学士。是时郎官及司徒领吏二万余人，虽复分布，见在京师者尚且万人，而应书与议者略无几人。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相从饱食而退。

《晋纪·总论》记干宝之言：其时，“朝寡纯德之士，今乏不二之老，风俗淫僻，耻失所尚。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荡为辩而贱名检，行身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到了西晋短暂的统一时期，统治者们虚伪的行径败坏了儒家伦理，加重了道德危机，终而导致经学的沉沦。可是，另一方面，他们出于维护其统治秩序和装潢门面的需要，又极力推崇和恢复儒家经学。晋武帝司马炎“以孝治天下”，重用何曾、王祥等孝子，立国子学，令各郡中正以“忠恪匪躬”、“孝敬尽礼”、“友于兄弟”等六条举淹滞。泰始四年(268年)诏令：

敦喻五教，劝务农功，勉励学者，思勤正典，无为百家庸末，致远必泥。士虑有好学笃道，孝弟忠信，清白异行者，举而进之；有不孝敬于父母，不长悌于族党，悖礼异常，不率法令者，纠而罪之。<sup>(27)</sup>

东晋时期，元帝“置《周易》、《仪礼》、《公羊》博士”<sup>(28)</sup>，穆帝“讲《孝经》”<sup>(29)</sup>，他们虽偏安江左，但也没忘了推崇儒学。整个西晋时期，儒家经学受到了统治者的推崇和提倡。《晋书·儒林传》说：“晋自中期，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尚玄虚，摈阙里之典经，匀正始之余论。”其实，玄学虽在士大夫之中有广泛的影响，而最高统治者们提倡和标榜的仍然是儒家经学。

## 二、经学的发展及其特色

在东汉末及魏晋乱世，不少儒者为了苟全性命，避难流窜，隐匿其身，如袁徽“避难支州”，王烈“避地辽东”，徐玠“避地荆州”，何夔“避乱淮南”，司马芝“避乱荆州”，杜袭、赵俨“避于荆州”。然而，作为儒家文化的保存者和传播者，他们并没忘却自己的职志，而是在荒

山野岭之中办学校,授生徒,颂《诗》、《书》,陈礼仪,使儒家经学在危乱之世仍能得以绵延和发展。据《三国志》记载:国渊曾“师事郑玄”,后“在辽东,常讲学于山岩,士人多推慕之,由此知名”。<sup>(30)</sup>田畴“入徐无山中,营深险平敞地而居,躬耕以养父母。……又制为婚姻嫁娶之礼,兴举学校讲授之业”。<sup>(31)</sup>管宁避于辽东,“乃因山为庐,凿环为室。越海避难者,皆来就之而居,旬月而成邑。遂讲《诗》、《书》,陈俎豆,饰威仪,明礼让,非学者无见也”。<sup>(32)</sup>东汉末叶及魏晋之际的社会动荡对儒学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但又为儒学在地方及民间的传播多少提供了新的机会。

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较有影响的儒者和经学传注。如周生烈著《论语周义例》,董遇著《周易章句》、《左氏经传章句》等等。《三国志·魏书·王朗传》说:“自魏初徵士熲煌周生烈,明帝时大司农弘农董遇等,亦历注经传,颇传于世。”董遇与贾洪、邯郸淳、薛夏、颍禧、苏林、乐祥七人亦被《魏略》称为“儒宗”。袁準“著书十余万言,论治世之务,为《易》、《周官》《诗》传,及论‘五经’滞义、圣人之微言,以传于世”。<sup>(33)</sup>乐祥闻谢该善《左氏春秋》,便向他求学问难,撰《左氏乐氏问七十二事》。后回归乡里,教授后进,“于是河东学业大兴”,“祥五业并授,其或难解,质而不懈,祥无愠色,以杖画地,牵譬引类,至亡寝食,以是独擅名于远近”。<sup>(34)</sup>王象“受诏撰《皇览》,使象领秘书监。象以延康元年始撰集,数岁成,藏于秘府。合四十余部,部有数十篇,通合八百万字。象既性器和厚,又文采温雅,于是京师归美,称之儒宗”。<sup>(35)</sup>管辂精于《周易》象数卜筮之事,他论说何晏“其才盆盎天水,所见者清,所观者浊”,何晏则称他:“君论阴阳,此事无双。”<sup>(36)</sup>虞喜“专心经传,兼览讖纬,乃著《安天论》以难浑、盖,又释《毛诗略》,注《孝经》”。<sup>(37)</sup>刘兆因《春秋》一经而三家殊途,诸儒是非之议纷然,乃思将三家之异合而通之,“作《春秋调人》七万余言,皆论其首尾,使大义无乖,时有不言者,举其长短以通之。又为《春秋左氏》解,名曰《全综》,《公羊》、《谷梁》解诂皆纳经传中,朱书以别之。又撰《周易训诂》,以正动二体互通其文”。<sup>(38)</sup>与刘兆不同,杜预则反对调和《春秋》

三传,他推崇《左传》而非《公羊》、《谷梁》,《杜氏新书》云:杜预“大观群典,谓《公羊》、《谷梁》诡辩之言,又非先儒说《左氏》未究丘明意,而横以二传乱之。乃错综微言,著《春秋左氏传集解》。”<sup>(39)</sup>此外,刘桢的《毛诗义问》,孙炎的《礼记孙氏注》、《尔雅注》,王基的《毛诗笺》,皇甫谧的《甲乙经》,束皙的《五经通论》,梅賾的《(伪)古文尚书》,郭璞的《尔雅注》,范宁的《谷梁传集解》、《尚书集解》,干宝的《周易注》、《周官注》等等,也都闻名于时。

在儒学发展史上,这时期经学著作中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主要是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和皇侃的《论语集解义疏》。姜广辉主编的《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二卷指出:“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在《左传》研究中有着重重要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春秋经传集解》的出现标志着春秋学研究的一个里程碑。正是由于杜预的‘经’、‘传’合一,使《左传》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阐释《春秋》的著作;正是由于《集解》对《左传》书例的归纳总结,使《左传》的研究脱离了字句训诂的窠穴,具备了真正解释学的意义。”杜氏书甫出,即受到一些学者的好评,《晋书·杜预传》载有秘书监挚虞的赞赏之语,《南齐书·陆澄传》也载有陆澄、王俭书的盛赞之言。隋唐以后,随着南、北经学的逐渐会通以及孔颖达《五经正义》的盛行,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渐据经学正宗地位。孔颖达《春秋正义序》谓:“汉德既兴,儒风不泯。其前汉传《左氏》者有张苍、贾谊、尹咸、刘歆,后汉有郑众、贾逵、服虔、许惠卿之辈,各为训诂,然杂取《公羊》、《谷梁》以释《左氏》,此乃以冠双屦、将丝综麻,方凿圆枘,其可入乎?晋世,杜元凯又为《左氏集解》专取丘明之传以释孔氏之经,所谓子应乎母,以胶投胶,虽欲勿合,其可离乎?今校先儒优劣,杜为甲矣,故晋宋传授,以至于今。……”孔颖达奉敕修《五经正义》,其《春秋正义》即据杜氏书以为定本,遂使此书发生了久远影响。尤其是杜预的《春秋序》,几乎主宰了其后的两千年《春秋》、《左传》的研究方向。至于皇侃,乃是南朝梁武帝时期著名的经学家,《梁书·儒林传》说他“少好学,师事贺场,精力专门,尽通其业,尤明三《礼》、《孝经》、《论语》。起家兼国子助教,于学讲说,听者



数百人。撰《礼记讲疏》五十卷，书成奏上，诏付秘阁。顷之，召入寿光殿讲《礼记义》，高祖善之，拜员外散骑侍郎，兼助教如故。性至孝，常日限颂《孝经》二十遍，以拟《观世音经》。丁母忧，解职还乡里。平西邵陵王钦其学，厚礼迎之。侃既之，因感心疾，大同十一年卒于夏首，时年五十八。”皇侃的《论语集解义疏》在历史上经历了一个失而复得的过程（大约亡佚在南宋，至清乾隆年间方从日本流回中国），南宋乾（道）淳（熙）以后即无复称引者，但这并不代表着它在历史上没有发生影响。比如，清廷修《四库总目提要》，在该书卷三十五《经部·四书类一》邢昺“《论语正义》二十卷”条下多次提及皇侃书，惜乎四库馆臣虽注意到“今观其书（邢昺《论语正义》），大抵剪皇氏之枝蔓而稍傅以义理”，却仍对邢氏《论语正义》大加赞赏，认为此书是由汉学到宋学转变的关键点：“汉学、宋学，兹其转关。是疏出而皇疏微，迨伊洛之说出而是疏又微。故《中兴书目》曰：其书于章句训诂名物之际详矣，盖微言其未造精微也。然先有是疏而后讲学诸儒得沿溯以窥其奥，祭先河而后海，亦何可以后来居上遂尽废其功乎？”而邢昺是在咸平二年（999年）奉诏校定旧疏编成《论语正义》，并颁列学官的。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直因其因皇侃所采卫瓘、蔡谟等十三家之说而撰此书。所以，《四库总目》对邢昺的赞扬，实因归功于皇侃的《论语集解义疏》。正是由于皇疏保存了大量汉晋关于名物制度的章句训诂和玄学思想，复经邢昺《论语正义》的继承和扬弃，才使宋代理学家得以“沿溯以窥其奥”。皇侃又有《礼记义疏》，成为孔颖达《五经正义·礼记正义》的依据，在经学史上亦起着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

言及这一时期的儒学，王肃及王学与郑学之争不得不提。王肃（195—256年），字子雍，海郯（今山东郯城）人。其父朗师事杨赐，著《易》、《春秋》、《孝经》和《周官》诸传。王肃除注解了大量的儒学经典外，还伪造了《孔子家语》和《孔丛子》。王肃少时曾师从荆州学派的宋忠，学《太玄》，但他没有像出于荆州经学的王弼那样开启一代玄风，而是将何晏等玄学名士斥之为：“前世恶人”。当然，王肃学说的锋芒所向，还主要不是玄学思潮，而是经学内部的郑学。《三国志·魏